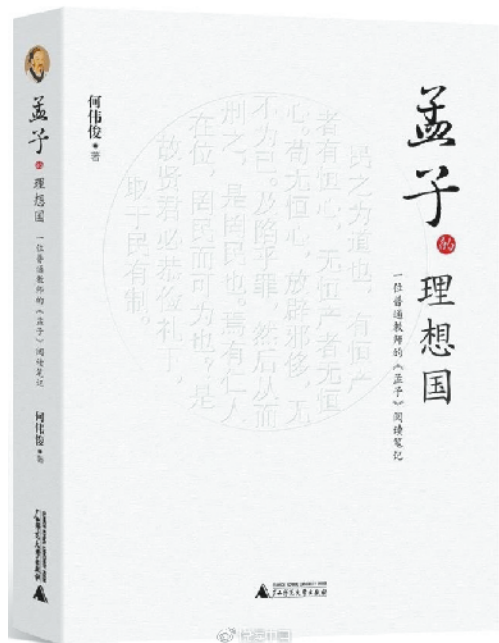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孟子的理想国》： 历史长河中的孟子



《孟子的理想国》
何伟俊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7.11

后世中国，如果有人写本《历史长河中的孟子》，一定是很有意思、也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以为儒家，就是“孔孟”，孔不离孟，孟不离孔。但在历史长河中哪里有这回事！从汉到唐安史之乱，把孟子当回事的人并不多。钱穆说“孟子发明性善之义，乃中国传统政治纲领，也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所依寄”，此话也只能说明、清，而不能及于宋元之前。

孟子论“性善”，同是儒家的荀子就不同意，针锋相对地以“性恶”立论。

汉儒不宗孟子，而宗子夏。所谓“诗书礼乐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”。把《论语》一句一句拿来注释的是子夏，没孟子啥事。孔子死后，儒分为八，子夏去了魏国西河，做了魏文侯的国师，孔子一语成谶，子夏真做了“小人儒”。在魏国，子夏培养出李悝、吴起，儒家与实际政治合流，法家渐渐兴起。后法家纷纷由魏入秦，助秦统一六国。

汉室兴起，董仲舒之儒即子夏之儒。孟子的“性善论”为董仲舒所不取。董子的人性论是“未善”。正因“性未善”，所以需要王教：“性者天质之朴也，善者王教之化也。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；无其王教，则质朴不能善。”

隋代之王通，虽然相信“性善”，但他不排佛、道，曰“三教可一”，没有孟子以辩士自居，勇排“杨、墨”的气势和偏狭，为后世儒者所大不喜。虽然他的思想对盛唐开放的文明有大影响，但后世被二程、朱熹等驱除出儒家正脉。

安史之乱后，韩愈排佛最力，拿出孟子做后盾。孟子从此从儒家的屋角向正堂移动。但韩愈在“人性”问题上并不尊孟，而是步孔子后尘，提出“性有三品”说。

宋代新儒学兴起，孟子先是登堂入室，然后经朱熹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为四书，终于“孔孟”合璧，君临天下。自那之后一个极奇怪的现象，大多数儒者都认为“孔孟没而圣人之学亡”，直到二程、朱熹，沦丧千年的圣学才得以赓续。

但二程当时极力抬高孟子，为苏轼所不喜。当年张载之关学、二程之洛学、苏氏父子之蜀学三足鼎立。苏轼一生“疑经、辩孟、非韩”，与二程针锋相对。以至后来朱熹对苏轼攻击不遗余力，连他的朋友吕祖谦都看不下去，劝朱熹“善未易明，理未易察”，盼望朱熹在学问上能够包容些。

朱子当时，有陆九渊心学、吕祖谦史学与三足而立，当时还有陈亮的永康“功利学派”。“儒学”思想何时不统一为一，何时大师就如星空灿烂。

到了大明，虽然朱元璋不喜欢孟子，但因为朱熹一家独大，因此孟子也跟着光照天下。但孟子和告子辩论时，批评告子不懂在“心上集义”，徒在事上用工，说要“勿忘勿助”，王阳明就不买账。王阳明说：“我此间讲学，却只说个‘必有事焉’，不说‘勿忘勿助’”。阳明是真尊重孟子，但并非亦步亦趋，而是独立思考。

到了清末，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，他读《孟子》中孟子和告子关于“人性”的辩论，得出结论说，真正有理的是告子，孟子是在徒逞口舌、强词夺理。

今日中国，与我亦师亦友的江苏兴化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何伟俊先生，效法当年钱穆先生以小学教师研究中国儒学的榜样，不妄自菲薄，在工作之余，辛苦耕犁，研究中国传统。先是出版《论语里住着的孔子》，今日再写出《孟子的理想国——一位普通教师的〈孟子〉阅读笔记》。

我读《孟子的理想国》，感觉何老师和孟子当年的学生万章、公孙丑等人一样，是真尊敬孟子，佩服孟子发明“性善之理”。但何老师不是一般亦步亦趋的庸俗学生，只会唱赞歌。在解释《孟子》时，每到孟子说得激扬处，他一方面说：“老师说得太精彩、太精彩了！”然后突然话锋一转：“老师，现在是21世纪。老师你这段话精彩，当然精彩，气势如长江大河，但好像不合今日之逻辑学。”

书中这样的地方有几十处，每次看到我都笑出声来。我设想，如果孟子能从坟墓里走出来，请他和他的今世弟子何伟俊先生喝茶辩论，一定非常出彩！我想孟子会很乐意。诚如王阳明所说：“此道问难愈多，则精微愈显。”因为没有万章、公孙丑等人的刺激，孟子的辩才就不可能展现得这么精彩，更不会有《孟子》这本书。

孟子力排杨、墨，在我看来，也多半找错了对象。孟子时，齐、魏相争，魏国由盛而衰，法家纷纷去魏赴秦，专制的阴云，已在西方兴起。而孟子所辩驳者，“杨”乃“保护私权”，“墨”乃“民间自保”，他们所维护的，正是孟子所身体力行的私人讲学，以及学问自由赖以生存的土壤。排杨、排墨的结果是“以吏为师”“焚书坑儒”。此后两千年的中国挂的是“孟子”的羊头，卖的是“法家”的狗肉。

今日中国，正处在第三次中西交流的关键时刻，中国传统如何继往开来？孔子云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何老师读经典，能独立思考，推陈出新，极为可贵，正是孔子所赞赏的好老师。

我想，这就是《孟子的理想国》在当下中国之意义。（新浪）

同治皇帝读书

在赵烈文的《能静居日记》中，有两处地方写到同治皇帝载淳读书，可谓趣味满满。

第一处，赵烈文记于同治三年（1864）五月十六日：“录庭芝语：今上初即位，从热河还京。弘德殿师傅李鸿藻扈从。庭芝曾于其时晤之，仰问圣性如何。李讷讷良久，乃言姿性平常，亦不乐攻苦。为皇子时，以李责课严，欲乞假入内，李不可，怒掷书于地，李强使俯拾，久乃勉取书起。今既登极，臣主之分严，规范稍难矣。”

吕耀斗字庭芝，是赵烈文的常州大老乡，做过翰林，所以能接触到翰林院讲学士李鸿藻。据吕耀斗追忆：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载淳即位不久，从热河回京。吕耀斗一时好奇，向李鸿藻探问这位小皇帝的天资秉性怎样。李鸿藻迟疑少顷后，还是讲了一句大实话，他说小皇帝的天资秉性很平常，无过人之处，读书也不爱下苦工夫。载淳做皇子时，小小年纪，李鸿藻就教他诵读经书，管教甚严，弟子受不了，想请假回宫，师傅不肯通融，弟子愠气，直接把课本撒到地上。师傅可不是吃素的，迫令弟子弯腰捡起课本，僵持了好一阵，弟子才勉强放低身段，把课本拾起来。眼下，皇子成了皇帝，君尊臣卑，李鸿藻再想规范载淳的行为就难上加难了。

咸丰末年，载淳满打满算也就五岁，这么小的孩子喜欢玩耍，不爱捧读那些劳什子的圣贤书，是可以理解的，师傅不准他逃课，他生气扔书，也很正常。李鸿藻一味用规矩去约束这位身份特殊的弟子，难免会引起他的反感。载淳成人之后，恭亲王奕訢的长子载澂引诱他微服出宫，去秦楼楚馆作狎邪游，沾染了梅毒。说白了，这位年轻的君主渴望呼吸新鲜空气，一旦觅得机缘，就罔顾一切，恣情纵欲。同治皇帝驾崩时才二十岁，实则从出生的那天开始，与其说他生活在紫禁城中，倒不如说他生活在一座掩埋活人的墓庐里，贵为泱泱大国的皇帝，却只能坐井观天，徒唤奈何。

第二处，赵烈文记于同治六年（1867）六月二十日：“是日闻竹庄言，今上聪慧而不喜读，一日与师傅执拗，师傅无可如何，涕下以谏。时御书适读至‘君子不器’，上以手掩‘器’下二‘口’，招之曰：‘师傅看此句何解？’盖以为‘君子不哭’也，其敏如此。又读‘曰若稽古帝尧’，‘曰若稽古帝舜’，‘帝’字皆读‘屁’字，观此则圣禀过人，而有雄杰之气可知。天祚国家，使益出于正，吾民其有豸乎？”

吴坤修字竹庄，是湘军文员出身，同治年间做过安徽布政使，赵烈文日记中的这段文字即是转述吴坤修的趣谈。载淳十一岁时，已坐了六年金銮殿，学业上还得继续用功。昔日，他做皇子时，耍性子扔书，师傅李鸿藻可以板着脸斥责令他他把课本捡起来，现在载淳掌握皇权，客大欺店，师傅们侍候这位弟子，难度可就大多了。他不听课，不服管教，师傅也就只能跪在地上规劝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那情景与“师道尊严”不沾边，在任何私塾中都见不到。但儿童毕竟是儿童，载淳也觉得让一位上了年纪的师傅跪倒在面前哭丧着脸怪别扭的，于是他急中生智，用手将《论语》中那句“君子不器”的“器”字遮掉下面两个“口”字，变成“君子不哭”，立刻就产生了幽默效果，自己上得了台面，师傅也下得了台阶，此举确实非常机敏。载淳读《尚书·尧典》中的“曰若稽古帝尧”和《尚书·舜典》中的“曰若稽古帝舜”，都故意把“帝”字读成“屁”字，既显露出小孩子顽皮的天性，也表现出小皇帝目空今古的胆色，因此赵烈文夸赞载淳“圣禀过人”“有雄杰之气”，甚至认为只要小皇帝日后多走点正道，国家就有福了，生民就有望了。

从赵烈文这两段日记文字来看，同治皇帝载淳成为一代雄主，原本可期。由五岁时的“姿性平常”到十一岁时的“聪慧”“圣禀过人”“有雄杰之气”，进步不是一点点大。他还有十足的幽默感，能让师傅破涕为笑。然而载淳的命运令人唏嘘，他喜欢的皇后阿鲁特氏是状元崇绮的女儿，才貌双全，性情高傲，不肯屈服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，婆媳关系形同水火。青年人生活在一团精神阴影之中，必定倍感苦闷。于是他决定去拥抱恶之花，释放自己的力比多，明知秦楼楚馆脏病猖獗，天王老子都惹不起，仍然斗胆去寻求冒险的乐趣。谁说“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”？同治皇帝载淳就因为出宫解闷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（新浪）